

序	洪扬生说：我杀了顾顺章的老婆，放了他的女儿……………	(2)
1.	顾顺章送走了张国焘，在汉口一住半个月醉倒在温柔乡里……………	(8)
2.	蔡孟坚年轻有为倍受蒋介石赞赏，在汉口抓获中共长江局负责人尤崇新。尤崇新叛变声称发现了中共特委负责人顾顺章……………	(12)
3.	徐恩曾做梦也没想到，他最信任的秘书钱壮飞竟是共产党……………	(15)
4.	周恩来在为苏区红军命运担忧的同时，对总书记向忠发与妓女姘居很不以为然……………	(18)
5.	顾顺章在街上被尤崇新拦腰抱住，两支乌黑的手枪抵住了他的脑袋……………	(21)
6.	顾顺章声称有对付共产党的大计划，但一定要面见蒋总司令……………	(24)
7.	蔡孟坚请示何成浚，决定包一艘小货轮将顾顺章解送南京……………	(26)
8.	六封有关顾顺章被捕的急电全部落入钱壮飞手中，他派女婿刘杞夫星夜赴沪传送情报……………	(28)
9.	李克农对刘杞夫说：“党是决不会忘记你的。”……………	(31)
10.	顾顺章一夜未眠，盘算着如何与蒋介石讨价还价……………	(34)
11.	钱壮飞逃离魔窟，在上海碰到了聂荣臻……………	(36)
12.	先到南京的蔡孟坚发现徐恩曾、陈立夫都在上海度周末，心里真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幸好遇到了张道藩……………	(39)
13.	周恩来得知顾顺章叛变后，痛苦万状地叹了口气……………	(41)
14.	密杀之夜，周恩来说：“孩子是无辜的。”……………	(45)
15.	蔡孟坚狠狠地埋怨顾顺章：“你怎么不早说呢！”……………	(49)
16.	蒋介石颇有兴趣地打量着顾顺章问：“我们有几年没见面了？”……………	(52)
17.	张道藩与蔡孟坚联手对蒋介石施“瞒天过海”计……………	(56)
18.	双重间谍杨登瀛对陈赓说：“哪怕明天就叫我上油锅下火海，我也不后悔交了你这样的朋友。”……………	(59)
19.	顾顺章事件余波：向忠发叛变……………	(63)
20.	顾顺章之死……………	(67)
21.	周恩来和他的最后岁月……………	(71)

序

洪扬生说：我杀了顾顺章的老婆，放了他女儿

1982年春天，我从复旦大学毕业，分配到上海市委某机关，搞落实政策工作。

此刻，党中央拨乱反正的方针大计已定，要求落实各项政策的人真可谓数以千万计。我每天接待来访，查阅来信，上门家访，忙得精疲力竭。

一天，办公室主任给了我一封信，让我看了信后上门到写信者家里去一趟。我漫不经心地翻开这厚厚一沓子信，才看了两页，就被信中所述的内容深深吸引住了……

写信者叫洪扬生，是一个1924年入党的老党员，以后担任过党中央的政治交通员。1928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成立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三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负责党中央的政治保护工作；特委下设中央特科，由顾顺章负责。特委是决策机构，特科是行动机构，就好比一个人，特委是头脑，特科是人的手和脚。中央特科成立不久，洪扬生便调入特科，担任特科一科的负责人。1930年前后，中央特科所做的每一桩工作，所进行的每一桩政治锄奸案，几乎都能见到他的身影，尤其是他亲自参加了由周恩来（党内又称伍豪、周少山等）、康生（当时名叫赵容）所直接指挥的处置大叛徒顾顺章的事件……

1930年前后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多事之秋。1927年“八七”会议以后，党中央各机关陆续搬迁到了上海，党的工作实际上分成了苏区工作和白区工作两部分。苏区工作即有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等领导

的中央苏区，许继慎、郭述申、徐向前等领导的鄂豫皖苏区，贺龙、周逸群等领导的湘鄂西苏区等；白区工作即是以上海为中心的地下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和其它革命活动，但党的工作中心无可争议地是放在白区的。党的六届一中全会产生的五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向忠发、苏兆征、周恩来、蔡和森、项英，无一例外，都留在白区。由十四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除瞿秋白留在莫斯科外，其余都在白区，而且几乎都住在上海。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对中国共产党人采取了极其残酷的屠杀政策，即所谓“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四·一二”政变以后，自接死在国民党屠刀之下的共产党的领袖人物便有李大钊、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蔡和森、向警予、澎湃、杨殷、夏明翰、恽代英等数十人，其中大多数人都是由于叛徒出卖而被捕牺牲的，这就迫使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采取同样的血腥手段严惩叛徒，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以求生存。中央特科第三科（又称打狗队、红队、红色恐怖队）就是党中央手中一柄出鞘的利剑！

1929年3月，国民党内部蒋介石集团与桂系军阀集团之间爆发了战争，史称“蒋桂战争”；1930年5月，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之间又爆发了规模空前的战争，史称“中原大战”。这场大战双方投入了一百多万兵力，足足打了半年多的时间。红军趁此机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当时在上海地下党中央担任中央政治局

主席的是向忠发，他工人出身，做过船工和码头工人，大革命期间担任过湖北总工会的负责人。有人说他工作能力不强，大字不识一个。据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委员的女工张金保回忆：向忠发还是有一定工作能力的，他识字不多，但口才很好，六届三中全会上作政治报告（当时通常称总报告），他看着字写得很大的报告提纲，滔滔不绝地讲了好几个钟头……但与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等相比，向忠发自然是相形见绌了。当时周恩来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组织部长，实际上主持着上海地下党中央的工作。1930年3月间，周恩来去苏联和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地下党中央的实际领导便落在了当时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宣传部长李立三身上。李立三从“左”的急性病出发，夸大了当时出现的大好革命形势，在6月1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他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7月下旬，由彭德怀指挥的红三军团一度攻克长沙，李立三兴高采烈，在8月初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作出决议成立全国总行动委员会，并要求成立各级行动委员会，统一领导党、团和工会的工作，并提出了准备全国暴动的详细计划，重点是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按照党中央的计划，各地纷纷组织兵暴起义，结果大多失败，损失惨重。

1930年8月，周恩来携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指示匆匆回国，19日（一说20日）到上海，当即与李立三碰面，严肃批评了李立三。8月22日和24日，中央政治局在云南南路477号（今云南中路171~173号）中央政治局机关连续召开两次会议，周恩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再一次严肃批评了李立三。8月26日，瞿秋白也从苏联回到上海，在周恩来、瞿秋白的批评帮助下，李立三认识了自己的错误。经过近一个月的酝酿准备，中

共中央在上海麦特赫司脱路（今泰兴路）一所临时租用的洋房内召开了三中全会，会议从9月24日到28日开了五天，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4人，其他代表22人。全会通过了《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决议案》，同时改选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被选为中央委员的有李维汉（罗迈）、贺昌、陈郁、邓发；候补中央委员有朱德、陈云、林育英、陈潭秋、恽代英。重新选举产生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为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项英、张国焘（化名特立）、关向应、李立三；政治局候补委员李维汉、徐锡根、卢福坦、罗登贤、温裕成、毛泽东、顾顺章。10月3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李立三去苏联；向忠发、周恩来、徐锡根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三人组成苏区中央局，先派项英去江西中央苏区，实际上周恩来的工作重心也开始转移到中央苏区去了。更重要的是，党中央已开始意识到苏区工作的重要性。

说来也怪，在立三路线盛行时，反对立三路线最激烈的是截然相反的两帮子人，一是大都从苏联归来的缺乏实际工作经验的王明、博古、何子述、王稼祥等同志（王明当时名陈绍禹，常用笔名韶玉发表文章，故又叫韶玉。王明是他再去莫斯科任中共代表团团长后起的名字。）；另一帮子是长期在基层工作具有较丰富斗争经验的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同志。这两帮子人都曾受到过李立三不同程度的打击。但是三中全会对这两帮子人的工作都没有做好，尤其是在全会上还继续批判了何孟雄，连何长期担任的江苏省委候补执委的职务也撤销了。以后周恩来曾多次感慨地说过：“三中全会在组织上也有错误，例如批判了何孟雄。”“其实那个时候，他的意见还是对的居多。”

1930年12月，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作为共产国际代表来到了上海，他秘密

召见了王明、罗章龙、徐锡根等，提出要召开四中全会，继续批判立三路线和瞿秋白调和主义路线的错误。米夫借口安全没有保障，将会期限限制在一天之内。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武定路修德坊6号（现武定路930弄14号）顾顺章主持的中央特科机关内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李维汉、贺昌、任弼时、罗登贤、温裕成、顾顺章、余飞、徐锡根、张金保、陈郁、关向应共14人，中央候补委员罗章龙、王克全、王凤飞、史文彬、徐兰芝、袁炳辉、陈云、周秀珠共8人，中央各机关工作人员王明、博古、沈泽民、管曦、王稼祥、陈原道、何孟雄、韩连会、徐畏三、肖道德、袁乃祥、顾作霖、柯庆施、沈克定、邱伴林共15人，此外还有国际代表米夫，记录为赵容（即康生）。会议从早上开始，一直开到深夜，共15个小时，唯一的目的是为了王明一伙上台。据张金保回忆：当时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有50余人，出席会议的22人还不足半数；大多数人被通知前去开会，只当作是去开中央紧急会议，并不晓得是去开中央全会。他们是设了圈子让我们跳；更荒唐的是米夫提议列席会议的王明等15人，与中央委员享有同样的权利，既有发言权又有表决权……

1月7日深夜，全会终于通过了米夫提出的据说是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的名单：王明、沈泽民、夏曦、韩连会、沈克定、徐畏三、王尽仁、黄苏、曾炳春9人当选为新的中央委员；王明、陈郁、任弼时、刘少奇、王克全增补为新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同时，李立三、瞿秋白、李维汉被清除出中央政治局；李维汉、贺昌还被清除出中央委员会……

1月8日，出席四中全会的罗章龙、何孟雄、徐锡根、陈郁、张金保等15人迅即召开了一个“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会后散

发了《告同志书》，要求国际派正确的代表来华主持全国紧急会议，成立临时中央，并在此基础上召开中共七大。王明一伙利用中央权力作出强硬反应，1月27日，中央作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王克全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王凤飞同志中央委员等问题决议案》，同时在江南省委（即前江苏省委）集中力量批判何孟雄。但是何孟雄再也不能同王明一伙展开斗争了，1931年1月17日晚上，他和李求实、林育南、蔡博真等在东风旅社被捕，2月7日即被枪杀在龙华监狱。鲁迅先生得知噩耗悲愤交加，写下了“忍看明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这样不朽的名篇。老党员李沫英在《党史资料·第七辑》中撰文回忆说：何孟雄入狱后，敌人在审讯时说：“是你们党内闹宗派，有人告密出卖了你们。”笔者在访问张金保时，老人深情地回忆：老何是被叛徒出卖而牺牲的。笔者问：谁出卖了他们？老人几乎不加思索地回答：王明一伙。笔者几经调查，造成36人被捕、24人被杀害的这桩惨剧的据说是一个名叫王拙夫（又名唐虞）的交通员（据《党史资料·第七辑》李沫英同志的回忆）。但是就连著名的美国学者、中国通费正清博士也认为是王明一伙告的密。他在《费正清对华回忆录》一书中写道：“1931年5位殉难的青年作家，连同英勇就义的19位即将离去的共产党领导人，他们实际上是一个较大集团的一部分。刚从莫斯科来继任的共产党领导集团，显然将机密泄露给了国民党，出卖跟他们抗衡的同志，这样既可以把他们除掉，又可以借殉难者进行煽动，真是一箭双雕。”王明一伙是否真的出卖过何孟雄等？这也许是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迷了。但毫无疑问，王明对何孟雄的被捕牺牲是幸灾乐祸的。当时担任江南省委秘书长的刘晓回忆道：“记得有一次省委会议上（王明时任江

南省委书记——笔者注），王明以紧张的口气提到，国民党特务已经在东方旅社住下，随时可能逮捕何孟雄等人。大家要求省委设法营救，至少先通知有关人员再也不要到东方旅社了。王说：他将与中央商量，叫省委不要管了。”老党员陈修良在《潘汉年非凡的一生》一书中进一步写道：将这一消息通报省委的是刚调入特科工作的潘汉年，大家听到这一消息都非常着急，王明却冷漠地讲：这批人是“反党的右派分子，是进行反党活动才被捕的。这是咎由自取。”

何孟雄等牺牲以后，罗章龙、徐锡根、王克全等走上了分裂党的极端，组织成立了“中央非常委员会”，一直到1932年2月由张金保接任“中央非常委员会”主席后，才断然宣布解散……

四中全会以及四中全会后接连发生的何孟雄等被捕牺牲，罗章龙等分裂党遭到清洗，坐享其成收益最大的是王明一伙。1931年3月，新的中央领导机构组成：总书记向忠发，政治局委员兼江南省委书记王明，中央宣传部长沈泽民（4月后由张闻天继任），中央组织部长赵容（康生），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中央党报编辑委员会主任王稼祥，团中央书记博古。但是仅过了一个月，由于顾顺章的叛变，整个地下党中央再也无法在上海生存下去了。

1931年6月22日，向忠发被捕，随即叛变，6月24日由蒋介石亲自下令处决；10月18日，王明离开上海去莫斯科，临走前经共产国际同意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声、赵容、陈云六人组成中央临时政治局。前三人为常委，博古负总责；1931年12月间，周恩来只身一人极其秘密地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1933年初博古率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临走时指定由卢福坦、李竹声、盛忠亮领导上海中央局，从1934年3月到1935年2月仅一年时间，上海中央局连续遭到六

次大破坏，卢福坦、李竹声、盛忠亮先后叛变；1935年7月上海中央局停止活动，整个上海的地下党除了极个别的组织和极少数的个人，被国民党破坏殆尽！

中国共产党的这一段历史，或许是除了林彪事件之外，最扑朔迷离令人捉摸不透的一段历史，没有一本正史认认真真地写过，许多的谜底至今远未解开：米夫真有那么大的权力？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远东局早已积怨很深，1930年2、3月间周恩来匆匆离开上海去莫斯科就是为了协调中共与国际远东局之间的矛盾。在白区这么险恶的环境里，不过半年时间连续召开两次全会，领导层大规模更迭，党内宗派主义情绪高昂，就不怕敌人趁机打入楔子？大批党的要员以革命的名义被派到各大苏区，几乎无一例外干出了一系列极其丑恶的“反革命”勾当，比如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在鄂豫皖，夏曦在湘鄂西，博古等在中央苏区……最终造成了整个苏区的大溃败大搬迁，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中共上海地下党经历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么严峻的考验，已摸索出了一整套在上海这块土地上生存下去的经验，并成功地上海生存了四、五年获得了大发展，为什么一夜之间会发生这么大的溃败？这无数的事件环环相扣，而顾顺章事件是其中极为紧要的一环。但仅就顾顺章事件而言，他是什么时候被捕的？他是怎么叛变的？是谁第一个将他被捕的消息密报给中央？地下党中央在谁主要领导下又采取了一些什么措施？顾顺章最后又是怎么死的？迷雾重重，讳莫莫深。自然，这其中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是真正的当事者实在是幸存无几了……

我怀着浓厚的兴趣拜访了洪扬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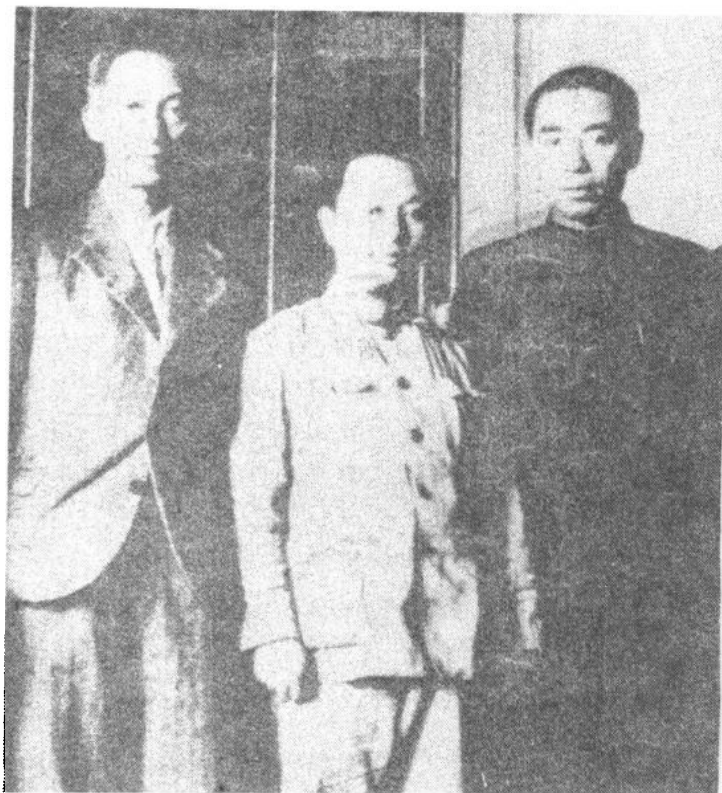
就连上海人也不会想到，在市中心，在大上海骄傲的南京路的一侧、在大上海最繁华的中百公司的背后，居然会有如此破败的房子——一条极其杂乱的马路，一条极其肮

脏的弄堂，一座极其破旧的小楼。我沿着漆黑一团而又陡峭狭窄的木楼梯，手脚并用爬到一层半的所谓亭子间，门开着，一股浓烈的酒气夹杂着其它难闻的气味扑面而来。我在楼梯口朝屋内打量了一下，不过四、五个平方米的房，搁着一张板床，好像连桌子板凳也没有，一个满脸胡茬子的老人，衣冠不整地坐在床头，手里还拿着一瓶劣质烧酒。我向他说明来意，他混浊的眼睛里闪出如同鹰隼一般的光亮，但不过一眨眼的工夫又熄灭了。他满脸狐疑地又望了我一眼，仰起脖子灌了一口酒，声音混浊地嘀咕了几句，好像问我是从哪里来的。我掏出工作证，他接过去看了半天，突然冒出一句：我杀了顾顺章的老婆，放了他的女儿……

顾顺章事件之后，由于中央特科是由顾顺章自接领导的，绝大多数人与顾顺章多年共事，顾顺章极为熟悉，对许多人的老婆孩子亲戚朋友均了如指掌，因而很多人处于极度困难的境地。周恩来召集他们亲自对他们讲：中央来不及妥善安置每一个人，如果有可能离开上海，就离开上海躲避一阵子，如果实在躲避不了，顾顺章来了，威逼你自首，中央也允许你们自首脱党，但决不能出卖朋友(同志)，今后等到上海成了共产党的天下，我会替你们作证……

周恩来会说这样的话？我极为惊讶。以后采访也在特科工作过的顾顺章的妻舅张长庚，他也认为好像是听别人讲起周说过这样的话……我细细一想，豁然开朗：中央特科的工作同志，尤其是红队的人，均为工人出身，对党忠心耿耿，对朋友一片赤诚，但文化程度不高，也没有其它所长。他们大多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离开上海这个环境连生存下去都有困难，周恩来的这个决定，实在是非常实事求是的……

为了免遭顾顺章的报复，红队的许多人还是离开了上海投亲靠友。李龙章就是在武



1938年吴玉章、王明(中)、周恩来合影

汉被顾顺章抓到供出了顾顺章一家被杀之事，酿成了轰动上海舆论界的所谓“爱棠村”事件，引出了《申报》上“顾顺章悬赏缉拿杀人凶手周恩来”的启事……

作为特科一科科长，洪扬生转移到了中央苏区，红军长征时被俘，做过一段时间国民党的“特务”，以后长期失业，飘落到上海，上海解放他兴冲冲地跑去找潘汉年。1931年初潘汉年从江南省委调中央特科，与洪共过事。“潘汉年应该晓得周恩来的布置和承诺”，洪扬生一再强调。但潘汉年敷衍了几句，将洪推出门口。1951年4月“大逮捕”，洪扬生一度被捉，后又被放了出来安置在工厂劳动；1958年再次被捕，断断续续关到1974年，始终没有被判过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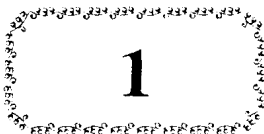
“潘汉年不是个东西！”洪扬生狠狠地骂道。以后我采访过许多人，都听到过这样的

抱怨。潘汉年活得很累，很痛苦，很警觉，他晓得的事情太多了，自己也不明白对于这许多事应该如何妥善处置。他决不是一个与人为善的人，在旁人需要他扶上一把的时候，他往往反而踢上了一脚，他命运悲惨，但许多活着与死去的人并不因为他命运悲惨而同情他！这实在也是一个历史的悲剧！

“李强替我作了证明！”洪扬生如是说。1929年底，由于苏区的扩大，上海地下党中央迫切需要加强与各苏区的电讯联系，于是成立了特科四科，由李强负责。洪扬生到处写信、写材料、写特科的点点滴滴……有一

封信转到了李强手里，李强作了批示，改变了洪扬生余生的命运。他进了上海文史研究馆，总算有了一个幸福的晚年，但有一个条件，他所写的一切材料都得转交给中央有关部门……

门依然关着，但正是从洪扬生开始，我萌发了要写一部关于顾顺章事件的纪实作品的念头，为此我作了近10年的努力。我自信自己的作品已经可以拨开迷雾，将历史袒陈在读者面前，不管这历史是丑陋的或是美好的。因为历史就是历史，它不应该由人随意编造。



顾顺章送走了张国焘，在汉口一住半个月醉倒在温柔乡里

1931年4月25日。

傍晚，汉口江海关的巨钟悠悠地敲响了六下，夕阳西沉，江面上闪金烁银，一片辉煌。

这是一条完全欧化的大马路，江边巨石垒起的高楼，像一只只巨大的怪兽，匍匐在江畔，虎视眈眈地注视长江，江岸上新栽的梧桐树已经吐出了一片翠绿，滔滔的长江迤迤而来，在这里江面逐渐开阔，江水也变得温和轻柔，只有那些褪去炮衣在江面上游弋的军舰，在提醒着你：战争离这儿并不遥远……

正逢周末，江堤上已经出现了三三两两的恋人，他们互相偎依着，旁若无人，喃喃地说着情话，在江海关前，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子正缓缓地沿着江堤走着，他身材适中，浓眉大眼，穿着一身质地考究的英国花呢西服。听着钟声，他从表袋里掏出一只镀金怀表对了下表，然后将表放入表袋。他眼皮跳了一下，小心地侧转身子，四下张望了一番，然后靠在江堤上，眼睛望着前方，显然是在等什么。

他叫顾顺章，中共地下党中央政治局的候补委员，中央特别委员会三人成员之一，中央特科的负责人。

顾顺章是在3月31日深夜离开上海到汉口的，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护送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国焘，少共中央委员陈昌浩经汉口前往鄂豫皖苏区的。

1930年9月24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麦特赫斯脱路（今泰兴路）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和新闸路之间一幢临时租来的花园洋房里，秘密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当时革命的形势确实不错，不过三年的时间中国共产党已经从国民党蒋介石的残酷打击下恢复了过来，党员已达12万人，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已扩展到全国的11个省300多个县，5000万人口，武装起来的红军也已经达到了10万人。为了加强对红色苏区的领导，三中全会通过决议在赣、湘、闽中央苏区设立中央局，同时在其它苏区设立中央分局，首先指派政治局委员关向应前往中央苏区成立苏区中央局。由于交通线发生了故障，关向应此行未获成功。10月29日，上海地下党中央通过中央特科设在慕尔鸣路安吉里的电台（今茂名北路111弄11号）电告毛泽东、朱德，指示由在苏区的同志先行成立苏区中央局，由毛泽东代理书记，同时改派项英前往中央苏区。小个子的项英先化装成工人，后又扮作农民，在路上跑了近一个月，终于抵达中央苏区，1月17日中央局总算在宁都县的黄陂成立了。

1931年1月7日，中共中央又在上海武定路修德坊6号（现武定路930弄14号）中央特科机关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会后新组建的中央政治局决定委派张国焘、陈昌浩和担任中央宣传部长的沈泽民前往鄂豫皖苏区，成立中央分局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由张

国焘任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沈泽民和他的妻子走陆路，从安徽六合一带直接潜入了金家寨；张国焘和陈昌浩走水路，护送他们一行的便是顾顺章。

本来像这样的事是用不着顾顺章亲自出马的。但是几个月以前，中央和长江局在武汉的秘密机关先后被国民党特务破获，苏立民、袁秉章、袁树人等几十人先后被国民党处决，武汉的地下党组织有全线崩溃的危险，周恩来派自己的得力助手顾顺章护送张国焘等去武汉，一方面是为了保卫张国焘一行的绝对安全，另一方面也是要顾顺章顺便将武汉的地下党组织重新建立起来。

3月31日晚上，顾顺章派他的助手杨福林将张国焘送到南京路上的新世界旅馆，当天深夜便和陈莲生搭夜车赶到了南京。第二天凌晨，张国焘扮成一个商人，杨福林则扮作他的伙计，他们俩雇了辆车，由在车行里工作的特科同志护送，直驰杨树浦码头，上了在工部局由英国商人注册的祥泰木行的货轮。此刻陈昌浩也由特科同志护送，上了这一条货轮。这一条货轮，船董是英国人，但船长、水手中大多数是共产党员。这艘船直接受中央特委领导，只有中央要员往返上海和汉口时才启用，此刻总算派上了用场。差不多就在这艘满载木材的货轮驰离上海时，顾顺章和陈莲生已经快要到南京了。

顾顺章和陈莲生一到下关车站，顾不上休息又跳上了一艘由洪帮掌握的小火轮直驰汉口。当时由上海至重庆的长江水运码头是洪帮的天下，顾顺章与洪帮大龙头徐朗西有很深的交情，而徐朗西众多的门徒又在长江沿线的国民党稽查机构里担任特务，其中汉口市的稽查处的副处长杨庆山也是与徐朗西关系密切的洪帮大爷。顾顺章一向善于利用青洪帮的关系，他相信坐洪帮的船比坐祥泰木行的货轮还要安全。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最终抓住顾顺章的还是杨庆山。可是

徐朗西却脚踩两只船，始终安然无恙，解放后还应邀担任了首届全国政协委员和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参事！

4月4日傍晚，祥泰木行的货轮靠上了汉口码头，张国焘和陈昌浩提着简单的行李从货轮上下来走出码头，陈莲生手里拿了一张当天的报纸，已经站在码头近候他们。等张国焘、陈昌浩与陈莲生接上了关系，一直提心吊胆的杨福林总算长长地吐了口气，到船舱里喝酒去了。

陈莲生替张国焘、陈昌浩每人雇了一辆黄包车，一直跑到日租界一幢高级的花园洋房里，顾顺章已经在二楼摆好了一桌酒菜准备替他们接风。双方见面少不了一番寒暄，酒过三巡，顾顺章却不无忧虑地诉起苦来。

“特立（张国焘党内化名），你们到金家寨，原先准备由中央设在汉口的交通站护送，现在看来这个机关已不能用了……”

“这……”张国焘望着顾顺章那张布满愁容的脸，情不自禁地搁下了酒杯。

“那……你再送我们回上海？”心急口快的陈昌浩讲。

“这……事情还没有糟到这个地步。”顾顺章苦笑了一下：“我已决定让金家寨派得力的交通来接迎你们进去，你看如何？”

张国焘想了想回答说：“我没意见。这一回少山（周恩来党内化名周少山）决定由你负责安排我们进金家寨，你看着办好了。”

“但是金家寨来的交通得三、四天以后才能赶到……”

陈昌浩看了一下周围舒适的环境笑了：“那我们在这里安安心心地住上三、四天。”

“唉！”顾顺章长长地叹了口气心里想：到底是吃洋面包回来的书生，哪晓得搞地下工作最忌讳的是在陌生的地方停留。他心里这么想，但嘴里还是说得非常婉转：“这里是由我直接掌握的交通站，很少启用，原来住上十天八天都不会有什么问题。只是这两天听

说日本暗探有点疑心……

“那……你看怎么办？”张国焘紧盯着顾顺章。

顾顺章避开张国焘的目光说：“我在汉口多少有点关系，我演魔术时在汉口收了几个徒弟，其中有些是汉口大名鼎鼎的阔佬，我看是否选上一家搬到那里去住几天。”

“这恐怕不行。”张国焘说：“大革命时期我在汉口工作过，认识我的人很多，万一让人认出来……”

“我看一动不如一静。”陈昌浩还是对这幢洋房深感兴趣：“你们看，里面书房里还有不少书呢，到了金家寨恐怕就很少有时间看书了，我们还是在这里耐心等待吧！”

“那也好！”顾顺章伸直脖子灌了杯酒，总算下定了决心：“你们就在这里耐心等待，千万不能出去。我去布置一下，保证这三、四天内不出问题。”

三天后的一个傍晚，顾顺章兴冲冲地坐了辆汽车领着一个刚从鄂豫皖苏区赶来的交通来到张国焘、陈昌浩住的花园洋房，一进门，顾顺章便叫了起来：“特立，特立，金家寨的交通来了！”

张国焘仔细打量了一下，只见来的是一个身材矮小的青年人，虽然风尘仆仆，但人却显得非常干练。

顾顺章问：“你们看什么时候出发为好？”

张国焘笑了笑回答：“这还是由你来决定。”

顾顺章回答：“那好，今天晚上你们准备一下，明天一早就走！”

“这么急？”陈昌浩捧着本书抬起头来。

“一切听从黎明（顾顺章党内的化名）的安排。”张国焘瞪了陈昌浩一眼，算是定了下来。

“还是早定为好！”顾顺章存心捧了陈昌浩一句：“今后你需要点什么书我让交通给你带去。明天一早莲生会去汽车站安排的，你

们在李家集下车，那边已派了一个特务队在李家集迎候你们。”

“这真太好了！”张国焘说。

“明天我就不来送你们了，祝你们顺风。”

8日一早，张国焘、陈昌浩在陈莲生的安排下由鄂豫皖苏区来的交通带领搭上了去麻城的汽车，下午顺利抵达李家集与特务队接上了头。他们翻山越岭整整走了一夜，次日进入了苏区。他们顾不上休息又走了一天，总算遇到鄂豫皖苏区的第一位基层机构的领导人——中共高桥区委书记兼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李先念。身材肥胖的张国焘脚底满是血泡，再也走不动了，憨厚的李先念让手下的赤卫队员搭了一顶大轿，由八个人抬着，一直将张国焘抬到了金家寨……

但是张国焘和陈昌浩做梦也不会想到，此刻顾顺章却在汉口醉倒在温柔乡里！

一连忙了几天，总算将张国焘、陈昌浩平安送走了，顾顺章却搬进了大智门车站附近法租界内的德明饭店里。白天他化名化广奇在新世界游乐场演魔术，晚上便与汉口最有名的交际花白小姐鬼混，一住就是半个月……

“顾老板……”一个身材壮实的青年人走上前来。他身着长衫，一副上等人家仆人的打扮，显得十分干练。他便是陈莲生。

“哦，是莲生……”顾顺章又看了下四周，迎上前去。

“我已经到码头上打听过了，祥泰公司的货轮明天一早开船。”

“唉，明天，明天……明天是礼拜天。”顾顺章望了望波澜起伏的江面说：“能不能让他们再停上一天？”顾顺章想着白小姐丰腴白嫩的身子，情不自禁地又叹了口气。

“我也是这么同他们说的，可船老大讲明天一定要走了。”

“那……是不是不要坐他们的船？”

“这两天风声很紧，”陈莲生跨前一步压

低了声音：“听稽查处的朋友讲，汉口市党部马上又要改组了，南京方面派了不少人过来。我看还是走吧……”

“那……好吧！明天一早说走，你……就在老地方等我。”



2

蔡孟坚年轻有为倍受蒋介石赞赏，在汉口 抓获中共长江局负责人尤崇新。尤崇新叛 变声称发现了中共特委负责人顾顺章

对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汉口的特派员蔡孟坚来说，这一段日子真可谓春风得意，吉星高照。

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年仅23岁、当时在蒋介石第九军司令部担任联络参谋的蔡孟坚，奉派到由冯玉祥、阎锡山盘居的北平活动，他冒着生命危险从北平潜入许昌，通过于佑任的关系，竟在冯玉祥的部下任应岐手中窃得了一本刚刚摸发的密电本，于是迅速离开任部，化装成英美烟草公司老板派往许昌收购烟叶的高级职员，坐牛车突破了两军对峙的封锁线，安然抵达马牧集，将密电本亲手交给了蒋介石，立了奇功。蒋介石利用这密电本随心所欲地调遣冯阎方面的军队，使处于劣势的蒋军反败为胜。蒋冯阎大战快要结束时，蒋介石在前线一棵如冠的大树底下召见了蔡孟坚，对他倍加赞赏，同时派他即往南京，见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秘书长陈立夫……

蔡孟坚风尘仆仆跑到南京，陈立夫立刻接见了，对他深加慰勉，同时委派他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汉口的特派员。这对一个毫无政治背景的中下级军官来讲是史无前例的。

蔡孟坚来到武汉，两眼一摸黑，手下连一个得力的干部也没有。武汉地处九省通衢，是国民党剿共的后方，当时担任武汉行营主任的何成浚上将，正被共产党频繁的“飞行集会”等活动搅得焦头烂额，一见蔡孟坚倒

是十分器重，便由他出面约见了正好在武汉的洪帮大龙头徐朗西，由徐朗西指派了汉口的洪帮大爷杨庆山等二十余人，成为蔡孟坚任处长的侦缉处的第一批人马。

蔡孟坚走马上任，为蒋介石真可谓披心沥肝。他曾化装成渔夫，潜入洪湖地区，亲眼看到过贺龙，这在国民党高级特务中是绝无仅有的。1930年11月，蒋介石在庐山召开了所谓“剿匪”会议，会后准备到汉口巡视。何成浚大肆铺张，准备借座汉口总商会，召开千人大会，为蒋介石捧场。这一计划被中共地下党长江局获悉了，通过内线秘密取得了出席会议的证件近200张，准备刺杀蒋介石。就在蒋介石下山前两天，蔡孟坚捕获了长江局的秘书夏华，经过严刑拷打，夏华叛变，供出了这一计划。蔡孟坚大惊失色，一方面面呈何成浚，一方面又通过调查科的秘密电台密告陈立夫和调查科科长徐恩曾。陈立夫即令徐恩曾和蔡孟坚同赴庐山，蒋介石立刻召见了他们，当场手书一纸命令，任命蔡孟坚为少将参议，并发给奖金一万元。此刻，后来成为军统特务头子的戴笠还挂着中校级军官的头衔在苦苦奋斗……

也就在这一次大搜捕中，蔡孟坚捕获了中共汉口地下党的几十处机关，抓获了中共长江局秘书长苏立民、中共中央组织部干事袁树人、中共湖北省军委书记袁秉章等近百人。苏立民等坚贞不屈，不久即被枪决；长江局负责人（一说为中共汉口市委负责人）尤

崇新叛变。蔡孟坚曾根据叛徒宋惠和的建议，让叛变自首的共产党变节分子到共产党活动比较频繁的几个区域站在马路上指认。由于当时的地下党活动区域比较狭窄，这个方法颇为奏效，于是尤崇新也乔装改扮被派上了大街，没料到几天下来却一无所获。蔡孟坚恼羞成怒，准备将尤崇新从街上撤回，重新关入监狱。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尤崇新匆匆跑来，说他发现了重要线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实为候补委员），特委负责人顾顺章可能就在汉口……

“顾顺章？”蔡孟坚倒吸了一口冷气。对于顾顺章，蔡孟坚了解得非常清楚，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当时许多人都这么认为，报上也这么记载，顾顺章被捕后自己也这么承认，其实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笔者注），与周恩来、向忠发、李立三齐名，号称中共的“四大健将”。他原来是上海兄弟南洋烟草公司的工人，1924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5年在“五卅”运动中崭露头角，然后被送到苏俄，表面上是在东方大学读书，实际上是在“格列乌”受特务训练，成为特务活动的一大行家。他双手都能使枪，擅长于化装，还掌握了缩身等妖术。1927年他回到上海参加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担任工人纠察队总队长。1927年底，共产党首脑机关陆续搬到上海，顾顺章负责中共首脑机关的保卫工作，几年来他一直在上海活动，足迹好像还没有离开过上海……

他冷冷地望了尤崇新一眼，漫不经心地问：“顾顺章？你看见他了？”

“没有……”尤崇新抹了抹脑门上沁出的汗水，颇有点紧张。

“那你怎么晓得顾顺章会在汉口？”蔡孟坚靠在椅子上，顺手拧亮了桌上的台灯。

“我在汉口新市场门口看到了化广奇魔术师在游艺场登台演出的广告。”

“化广奇魔术师？”蔡孟坚一脸困惑。



蔡孟坚，时年 24 岁

“是的，化广奇是顾顺章的艺名。‘清党’前我在上海，曾在顾顺章手下干过。这个人喜欢玩魔术，还在卡德路（今石门路）上开设过一个魔术用品商店，他自己也常常用化广奇的名字上台演出。我……我问过游艺场的老板了，说化广奇昨天晚上还演出过一场，今天，今天……”尤崇新结结巴巴地说。

“好，好！”蔡孟坚兴奋得跳了起来：“你马上到新市场一带去活动，我派叶明亮、周执中等几个弟兄紧盯着你。如果你看到顾顺章，立即呼喊，千万不能让他跑了。”他走到尤崇新身边，伸出手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尤先生，如果你抓到了顾顺章，那就为政府立了一个大功！我面呈何主任，给你一笔钱，送你到日本去留学。”

“谢谢蔡处长。”尤崇新深深地朝蔡孟坚鞠了个躬，又抹了把脸上的汗水，匆匆地走

了……

天色渐渐地昏暗了，偌大的办公室里空空荡荡，静寂无声，只听到立地座钟的指针在铿锵铿锵地跳动着。蔡孟坚望了望窗外，凝了下神，走到办公桌前抓起电话，要通了侦缉队，他低声吩咐了几句又立刻将电话挂断

了。他转身坐到沙发上，拉开抽屉，在“匪情通报”里翻了许久，寻出一张模模糊糊的还是顾顺章担任上海工人纠察队总队长时的照片，将它搁到写字台上，久久地凝视着，心里默默地叨念：顾顺章，顾顺章，看你这一回怎么逃出我的手掌！

3

徐恩曾做梦也没想到，他最信任的秘书钱壮飞竟是共产党

人的一生往往是由许多偶然因素所构成的，一件小事往往就决定了他一生中的命运。

1931年的4月25日，是徐恩曾一生中最灰暗的一天！如果没有陈果夫、陈立夫的帮助，正处在人生辉煌之中的徐恩曾就因为这一天，将黯然失色地走到生命的尽头。

刚吃过午饭，这位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科长就坐在中山东路305号“正元实业社”他的秘密办公室里，百无聊赖，就等着坐车回上海去度周末了。这位国民党的大特务头子临死前在美国用英文撰写的回忆录《暗斗》中不无遗憾地讲：“我确实做梦也没有想到，钱壮飞会是共产党”，他这个人“平日埋头作事，不问外务，不怕辛苦，忠于职守，事情做得又快又好，是个循规蹈矩的干练青年”。陈立夫1970年7月2日在写给蔡孟坚的信中也说：“当时双方作渗透工作，无孔不入，可均兄（徐恩曾字可均）录用钱壮飞为一大疏忽……”

其实，徐恩曾并不是一个做特务的料子，他身材颇长，皮肤白皙，长得眉清目秀，一副美男子的模样，如果做电影演员，或许倒成为了一个大明星！他小学、中学都在上海南洋公学读书，成绩优异，毕业以后考入交通大学电机系，以后又自费到美国去留学，学的是电气工程。他是一个颇有真才实学的人，大学毕业在美国西屋电气公司实习，老板很赏识他，但他还是执意要回来，搞“科学救国”。他英语说得非常流利，自己会开汽车，

也会修理无线电，甚至他当了大特务头子以后手底下特务用的收发报机还是由他自己设计的。他平时喜欢打桥牌、跳舞、打网球、打猎……一副西方人的派头。

徐恩曾是浙江吴兴人，与陈果夫、陈立夫是同乡，据说还有点拐弯抹角的亲戚关系。20年代初叶徐恩曾在美国留学时，恰好陈立夫也在美国，徐恩曾就在陈立夫的介绍下加入了国民党。回国以后他未能如愿搞科学，搞实业，而是由陈立夫推荐先在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工作，以后又接替叶秀峰，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科长。

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是中统特务组织的原始机构，原来叫党务调查科，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山头众多，成立这个调查科，顾名思义是蒋介石出于调查和掌握国民党内各派系活动的目的。

1928年2月，蒋介石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下令成立调查科，首任科长是陈立夫。1929年陈立夫升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调查科长一职即由他的密友、刚从法国留学归来的张道藩担任；以后吴大钧、叶秀峰都曾干过一个时期的调查科长，但真正使它获得巨大发展的是徐恩曾。他在这个位置上干了15年，将小小的调查科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令人谈虎色变的中统特务组织。

1930年，蒋介石亲自下令将经过政治警察训练的中央军校第6期毕业生共20人派到调查科工作，这些人中有马绍武、马啸天、

游定一等，以后均成为中统的骨干。但是蒋介石自己也没有想到，这其中竟会有一个共产党员，他便是钱壮飞。

钱壮飞是浙江湖州人，与徐恩曾小同乡，这在讲究重用乡党亲谊的国民党内十分重要。1925年他在北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介绍人是他妻子张振华的兄弟张暹中。大革命失败以后他从北京逃到上海，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他先在上海公用局做过抄写黄包车执照的差事，以后又到开封冯玉祥的部队里混了几天。1929年他从报上获悉消息，考取了国民党中央军校办的无线电训练班。由于他学习成绩优异，又是徐恩曾的小同乡，到调查科以后深受徐恩曾的赏识，很快就担任了徐恩曾的机要秘书。调查科原来与中央组织部同在丁家桥办公，人员扩大以后，徐恩曾借口丁家桥不利于保密，便租了中山东路305号王学仁的一幢房子（此人后来也加入中统），这幢房子半是中式，半是西式，门口很小不引人注目，但里面却很大。徐恩曾在305号门口挂了一块“正元实业社”的牌子，据说“正元”两字是取蒋中正和徐的情妇王书元最后一个字拼凑而成。徐恩曾在里面设了一间办公室，作为他的机要秘书，钱壮飞就住在他的楼上。但是徐恩曾做梦也没有料到，此刻钱壮飞已与共产党接上了关系。

钱壮飞的夫人张振华是安徽桐城的名门望族，她有一个老乡叫胡底。钱壮飞和张振华在北京时，胡底在中国大学念书，平时就住钱壮飞家里。张振华比钱壮飞大两岁，入党也比钱壮飞早一年，胡底在张振华的介绍下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钱壮飞与胡底正可谓莫逆之交。

1929年胡底在上海一家影片公司的摄影棚里认识了李克农，与李克农接上了关系，同时也将钱壮飞介绍给了李克农。此时李克农正任中共沪中区委的宣传委员，他似乎还没有意识到钱壮飞所处的位置有多么重要，

只是通过区委向党中央作了汇报。周恩来获悉了这一情况后极为重视，他亲自布置顾顺章对钱壮飞进行考察，然后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提出：要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拿出来为我们服务。中央政治局同意了周恩来的意见，于是决定将李克农从沪中区委调出，直接建立一个由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组成的党小组，李克农任组长。该党小组直接受顾顺章领导，负责与他们联络的是中央特科负责情报工作的二科科长，化名为王庸的陈赓。

李克农接连不断地搬了几次家，与过去的同志和朋友断绝了一切关系“消失”了，他在钱壮飞的帮助下与胡底一道考进了直接由调查科掌握的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由钱壮飞安排任命为电务股长，掌管起了上海与各地秘密的电讯往来。胡底则被派往天津创办国民党在北方的情报机构，公开打出的牌子是“长城通讯社”。李、钱、胡三人好像一只铁三角，埋藏在国民党特务的心脏里，这铁三角的尖顶就是钱壮飞。

徐恩曾事必躬亲，工作异常勤奋，但是有一个最大的毛病便是好女色。他和原配夫人梅子瑛早已分居，第二个妻子叫王书清，但徐恩曾得陇望蜀又垂涎王书清的妹妹王书元，此刻正与书元姘居在“正元实业社”里。他嫌南京冷清，几乎每个星期六都要带姘妇到上海去度周末。这天上午他翻了翻昨日《申报》刊登的广告，只见上面写着新落成的夏令配克大戏院（今新华电影院）周末将公演歌舞晚会。广告词不知出于哪个文人之手，写得香浓美艳：

花团锦簇，千紫万红皆逊色
风光旖旎，百褶罗裙如柳摇
羊脂白玉，粉队争妍在腴腿
脂香四溢，美人撩眼尽醉迷

“美人撩眼尽醉迷……尽醉迷……”他喝了口清茶，捧着报纸，击节赞叹。然后起身，亲自跑到二楼钱壮飞的办公室里。

“钱秘书，钱秘书，今天你是不是跟我一道去上海度周末……”

“噢，不了。”钱壮飞一眼看穿了徐恩曾的心思：“这几天我手头正好有点事，脱不开身。徐科长，你有什么事需要我办？”

“噢，这样……这样……书元总是缠着我要去夏令配克看一场歌舞，你看……”他将报纸递给了钱壮飞。

钱壮飞瞥了眼报纸的广告，浅浅一笑：“这事好办，我拍个电报给杨特派员，让他在夏令配克给你订两张票子。”

“好。”徐恩曾非常满意，“你看是坐火车去，还是坐汽车……”

“还是坐汽车吧！调查科刚刚买进一辆

1930年美国福特车，正好派上用场……”

“不错。”徐恩曾满意地拍了下钱壮飞的肩头：“就这么办吧，钱秘书，你有什么东西要带给你的太太？”

钱壮飞笑了笑回答：“这就不用麻烦徐科长了。”

两点敲过，一辆崭新的1930年福特车已经停在正元实业社的院子里。钱壮飞跑到徐恩曾的房间门口轻轻敲了两下门，徐恩曾挽着王书元从屋里走出来跳上了汽车。临行前他还探出头来对钱壮飞说：“钱秘书，有什么紧要公文就放到我的写字台上。下礼拜总司令要召开中执会例会，明天晚上我一定赶回来……”

“好的。”钱壮飞毕恭毕敬地朝徐恩曾点了点头，他目送汽车徐徐开出正元实业社的大门，脸上露出了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